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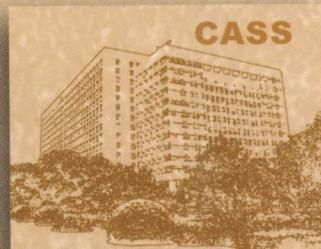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科研基金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

(1957~2010)

王保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

(1957 ~ 2010)

王保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2010 / 王保生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7922 - 4

I . ①文… II . ①王… III . ①中国文学 - 文学评论 - 编年史 -
1957 ~ 2010 IV .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3196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 (1957 ~ 2010)

著 者 / 王保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2.75 字 数：346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22 - 4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LITERARY REVIEW

文学评论

1

2010

国内刊号CN11-1037 国际刊号ISSN0511-4683 国外代号MB24 邮发代号2-26



2010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封面

文学评论

LITERARY REVIEW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CRITIQUE LITTERAIRE

CRITICA LITERARIA

1
2000

2000 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封面

LITERARY REVIEW ISSN 0511 - 4683

文学评论

- 南朝文学三题
- 毛泽东文艺思想不容歪曲和诋毁
- 近十年来国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述评
- 弹性语言
- 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

1990

1

1990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封面



1986年1月《文学评论》第1期封面

WEN
XUE
PING
LUN

1 1978

文学评论

1978年2月，《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封面

文学评论

3

1966

WENXUE PINGLUN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学评论》出至此年第三期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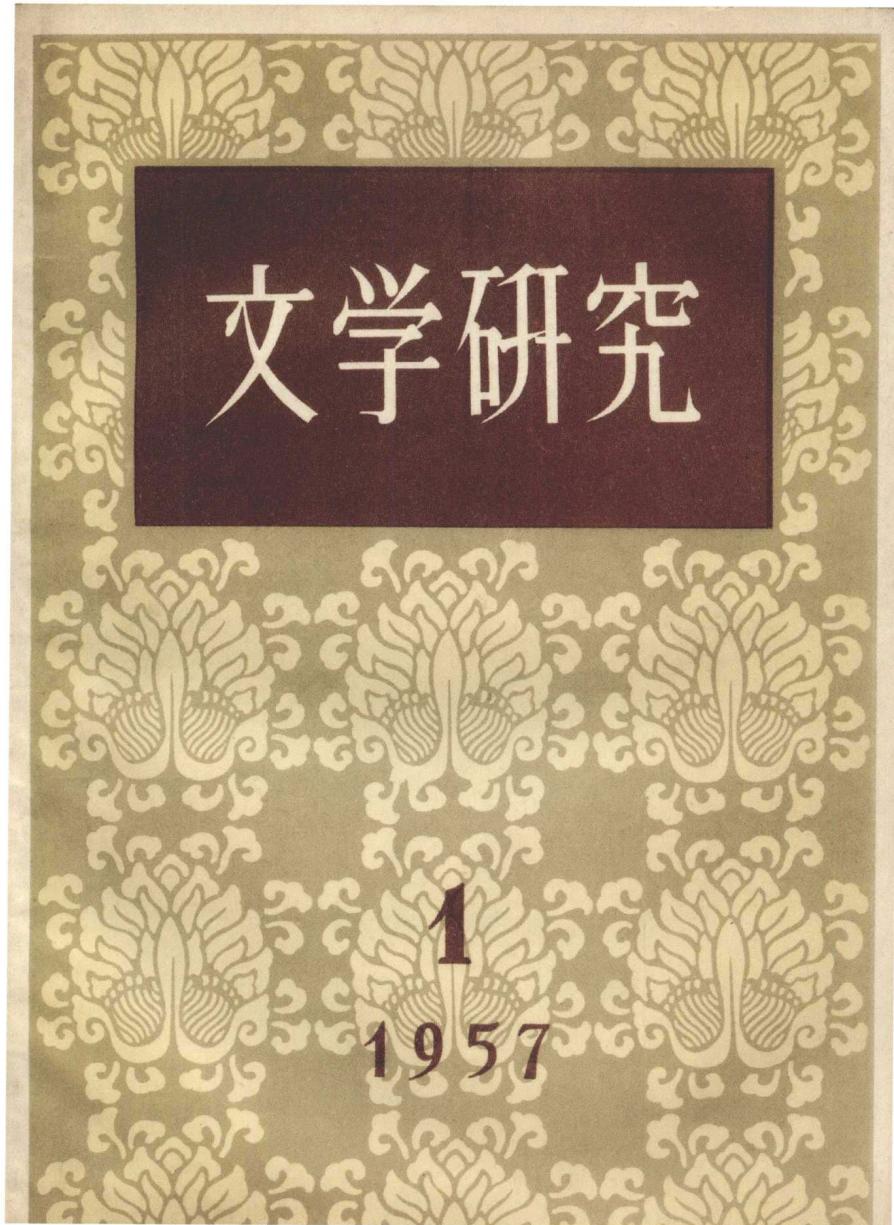
WEN XUE PING LUN

文学評論

1959



1959年2月，《文学研究》改名《文学评论》（双月刊）第一期封面



1957年3月《文学研究》季刊创刊号封面

何其芳与《文学评论》

——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代前言）

王保生

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九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九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上，在它的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2月《文学评论》复刊，开始了它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进入21世纪，《文学评论》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无论是《文学评论》一茬一茬的编辑人员，还是文学研究所的新老研究人员，都认为今天的《文学评论》是何其芳同志主政的前期《文学评论》办刊思想、办刊风格的继承，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纪念文学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時候，学习何其芳同志的办刊思路，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作为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刊物，研究《文学评论》，不能不从文学研究所的办刊方针谈起。文学研究所是1953年2月正式建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机构，当时文学研究所的正副所长郑振铎、何其芳，运用他们各自的影响，把全国一批有影响的知名文学研究专家聚集到所内，展开对中外文学的全面、系统研究。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是何其芳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他创

作的所有文章中最大、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一方面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培育了一种作风，为学术骨干人才的会集和后续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创办《文学研究》，为学术探索和交流提供了由文学所牵头、泽被全国文学研究界的园地，影响就更为深远^①。

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何其芳就提出，文学研究所的学风应该是：“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他对之进行的解释是：“谦虚的反面是自满和骄傲，刻苦即是反对不努力，不刻苦。别人对我们有误解，以为我们涣散，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在一定时期就会拿出有一定水平的成果。实事求是即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态度，‘是’者乃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它的规律性。学术工作上的主观主义之一是臆测，武断，牵强附会；另一表现为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往文学现象上硬套，即是教条主义。”《文学研究》的创办，就是在文学研究所的这样一种国家队的学术定位，所内聚集着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以及一种科学的建所方针和学风深得人心的基础上，迈开它前进的步伐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指导文学研究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些领导，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亦秉持着一种积极的、科学的促进态度。

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回顾中说明《文学研究》创办的历程：1955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来文学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周扬同志强调文学研究所要系统地研究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注意吸收外国文艺对我们有用的养料。何其芳在会上说：“我们许多研究论文和当前的需要及刊物的特点不符合，不能发表，这对我们工作不方便，我们准备自己出刊物。”这一想法得到周扬的支持，这可以视为《文学研究》创刊的最初动议。这年7月，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出版，此后陆续出至第5册，这可以视作《文学研究》创刊的尝试。

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宣传部鉴于在社会科学的几个主要学科，已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应的几

^① 杨义、郝庆军：《何其芳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个研究所分别主办《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研究》等全国性的学术期刊，因此赞成文学研究所创办《文学研究》季刊，以利于在文学研究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团结全国文学研究的工作者，繁荣与发展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11月24日，筹备中的《文学研究》召开第一次编委会，何其芳传达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关于办刊的思想，提出办这个刊物要抛掉那些束缚研究人员的清规戒律，主要多发表专家的稿子。编委会上确定了刊物的方针任务，内容范围和取稿标准，同时也通过自选和推荐的方法，确定了创刊前所需的各类稿件。

第一届《文学研究》的编委会由35位学者组成，他们是：卞之琳、戈宝权、王季思、毛星、刘大杰、刘文典、刘永济、孙楷第、何其芳、余冠英、罗大冈、罗根泽、陈中凡、陈涌、陈翔鹤、林如稷、陆侃如、季羡林、俞平伯、郑振铎、范存忠、唐弢、夏承焘、徐嘉瑞、郭绍虞、冯至、冯沅君、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黄药眠、杨晦、蔡仪、钱锺书、钟敬文。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年逾九旬的陈涌同志还健在；其余的学者都已作古。认真分析这份编委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没有党政官员挂名，清一色的是当时我国文学研究界最为知名的专家学者，阵容之强，极一时之盛。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占绝对多数。而现当代文学方面，当时尚未形成阵容强大的专家群体。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被划为“右派”的编委就一个个悄悄地被除名了。

这样的一个编委会，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实际状况，它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定位。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也没有领导题词，只有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交代了创刊的缘起。现在看来，这篇“编后记”是那么平实、谦逊，没有当时一些刊物的高调浮词，也没有我们今天常见的那种张扬夸饰，只是很实在地说，创办这样的一个刊物，是因为“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配合形势的那种时评性的文章有必要，但重点要放在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上，这是

《文学研究》这一学术刊物的定位决定了的”。这里的关键词是“长期的”和“专门的研究”，它是社会科学研究出成果、出精品的本质要求，因此“编后记”进一步申论：“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何其芳在短短的文字中，三次提到“百家争鸣”，他提出，“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其芳同志深得学术研究三昧，他真正是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来指导《文学研究》的工作的。

《文学研究》创刊号发表论文 12 篇，由于集稿时间关系，只能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的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的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都是国内知名专家经年苦心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豪华阵容”，恐怕是中国期刊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举。文章的大气厚重，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刊风。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的创刊，立即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首印 5 万多册，许多没有来得及预订的读者，纷纷来信要求购买或再印。

但是好景太短了，1957 年，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份。等到《文学研究》第 2 期出版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因为是季刊，刊物无法跟上突变的政治形势，所以这一期除发表了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15 周年而撰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外，重点

是刘绶松、刘永济、冯沅君、杨绛等人的九篇学术论文。第3期出版时已是9月中旬，全国的“反右”斗争热火朝天，因而这一期的《文学研究》在刊首发表了署名“《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文章《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专对右派分子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进攻作了一些驳斥”，大部分的篇幅给了钱锺书、唐圭璋、夏承焘关于古代诗词的考证文章，仍然跟不上形势。直到年底出版的第4期，才发表了两篇批判“右派分子”陈涌、丁玲的文章，大部分文章还是论述中外经典作家作品，与社会上铺天盖地的批判“右派分子”热潮相比，显得颇为“落后”，当时，何其芳同志经受上面和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

何其芳是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年他在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文学系任系主任，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曾奉党中央之命，与刘白羽一起到当时的国统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宣传《讲话》的重要精神。1957年和1962年，在《讲话》发表15周年和20周年之际，其芳同志先后在《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上发表《回忆、探索和希望》和《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充分肯定《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并结合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阐发他的理解。他认为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方针，因而是努力要把这一方针贯彻到治所和编刊中去的。

还是在1956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座谈会，周扬再次提出学术讨论要贯彻“双百”方针，不扣帽子，畅所欲言。并提出刊物“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选稿标准。何其芳是完全赞成的。1957年初何其芳在一次会议上说：《文艺报》说我们学院气太重，但我们认为学院气太少。有人批评文学所搞的是学院派，何其芳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搞学院派，马列主义学院派又有什么不对？”为了保持刊物的这种学术要求，其芳同志是一直顶住当时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的。他为《文学研究》定下的取稿标准，始终强调：除了政治标准而外，还需要有一个学术标准，这就是一般的文章都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材料，有自己的见解并有科学的依据。此前的《文学研究集刊》曾收到孙楷第先生